

日本在清末“丁戊奇荒”赈灾中的国际援助

The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of Japan in the “Ding-Wu Disaster” in Late Qing Dynasty

李冬松
LI Dongsong

清末「丁戊奇荒」における日本の国際救援活動

要旨：「丁戊奇荒」は中国清末において発生した超大規模の飢饉である。この飢饉の被害程度と被害範囲は史上稀であり、新聞・雑誌などの近代的マスコミによって素早く全世界に伝わり、日本の「東京日日新聞」、「朝野新聞」、「報知新聞」等のマスコミも連続でその被害状況を報道した。そして、洪沢栄一をはじめ、日本財界の益田孝、岩崎弥太郎等の大物がいち早く中国向けの募金に取り組み、竹添進一郎に救恤米の調達を委託した。竹添進一郎は自ら中国被害地に赴き、救援活動を展開した。日本の援助は中国の焦眉の急を緩解しただけでなく、最も有意義であったのは中国に飢饉成因の認識、救援方略の制定などに近代的新風を与えてきたことである。そのような意味からいえば、「丁戊奇荒」は中国史上において、中世の飢饉救済から近代的飢饉救済に変わったきっかけとなったと言える。

キーワード：丁戊奇荒；河南奇荒鉄涙図；救恤；中国；日本

一、“丁戊奇荒”与《河南奇荒鉄涙図》

清末光绪初年，发生在鲁、冀、晋、豫、陕等华北五省的大饥饉，史称“丁戊奇荒”，因1877、1878年按照天干地支纪年分别为丁丑年和戊寅年而得名。这次饥荒的破坏力之大为中外历史所罕见，其中尤以光绪三年、四年为最。清廷派往山西稽查赈务的前工部侍郎阎敬铭哀叹：“古称易子而食，析骸而焚，今日晋省灾荒，或父子而相食，或骨肉以析骸，所在皆有。”^[1]卷82：5633《申报》还报道了河南灾区杀女疗饥的惨剧：“迟日往访，不图其父母饥饿难忍，女已身在釜中矣。”^[2]第1809号第2版《万国公报》报道说“如此惨状，自古未闻”。^[3]第八册：5088-5089

在“丁戊奇荒”中，河南的灾情极为严重。为了将河南灾情传播出去，促进河南的赈灾活动，江浙义赈同仁谢家福、郑观应等效仿咸丰年间余治的《江南鉄涙図》，刊发了《河南奇荒鉄涙図》。^[4]《申报》在光绪四年二月十二日的《阅河南奇荒鉄涙図书后》一文中对该书的成立过程做过详细的叙述：“前闻吴门谢君绥之因中州全省各处旱灾，……因与同郡田君子琳揣度荒象，曲意描摹，绘成十有二图，名曰《河南奇荒鉄涙図》。”^[5]第1804号第1版《河南奇荒鉄涙図》刊印后，影响超出了谢家福等人家乡苏州的范围，迅速成为了上海义赈同仁的主要宣传材料。光绪四年三月间，郑观应等人创设随轮船募捐之法时，便于每船散发《河南奇荒鉄涙図》一幅；^[6]第1839号第3版并有时人对同仁辅元堂提出建议：“或即将河南奇荒鉄涙図置之箝旁，庶可阅后即动善心。”^[7]第1855号第1版从此后上海各地“悬帖鉄涙図路设箝”^[8]第1883号第1版的情形来看，该堂很可能接受了这个建议。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河南奇荒鉄涙図》迅速扩散到了海外，总部设于伦敦的“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仅把图册的中文译成英文，就当作募捐的宣传材料广为散发。^[9]196

根据高桥孝助的研究，《河南奇荒鉄涙図》的刊印始于1878年初，并迅速传递到了灾荒一线河南。高桥的依据是河南开封府陈留县申伯裔在《协助豫赈征信录》中的记述，^[10]137其中提到：“时灾况日深，赈款日绌，诸君驰回南中，为灾民请命，苏州熊其英诸君投袂而起，别谋于乡之善士，另设筹赈公局于桃花坞，刊布鉄涙図捐册，集款十五万有奇。”^[11]5576《河南奇荒鉄涙図》刊印后不久即被传送到河南并为传教士所接触的证据还有

1879年8月英国“中国饥馑救济基金委员会”在赈灾结束后写给议会的报告书，其中记载有西方传教士于1878年3月进入河南南阳府、开封府赈灾时，受到当地民众的强烈抵抗的经过。就是在这期间，他们接触到了《河南奇荒铁泪图》，并发现它已普及于河南各个地区。^{[9]129, [10]137, [12]19}

“丁戊奇荒”发生后，迅速引起了以慈善事业为传教媒介的西方传教士的注意。在山东传教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几经周折，于1877年3月9日率先成立了“山东赈灾委员会”，负责对山东灾民的募捐和救济。在“山东赈灾委员会”的影响下，“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简称“上海委员会”于1878年2月26日在上海正式成立。应上海委员会的请求，1878年2月在英国成立了以前驻华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 1807-1897)为主席的“中国救济基金伦敦委员会”，该委员会共有三十一名成员，其中有一般的传教士，也有外交官员，还包括议会议员乃至皇家会员。^{[12]5}“中国救济基金伦敦委员会”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唤起英国民众的同情，他们邀请近代英国第一位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将《河南奇荒铁泪图》中的汉语翻译为英语，翻刻制作了在英国宣传赈灾的小册子“THE FAMINE IN CHINA”(参见附图1)。《河南奇荒铁泪图》中对灾情的描述极为精炼，而理雅各的英文翻译也非常到位。例如，原图第一幅图的标题是“借贷无门卖田拆屋”，而“THE FAMINE IN CHINA”第一幅图的标题是“THEY SELL THEIR FIELDS AND TAKE THEIR HOUSES TO PIECES”(参见附图2)；^{[12]12}再如，原图第五幅图的标题是“饥寒难忍悬梁投河”，而“THE FAMINE IN CHINA”第五幅图的标题是“SUICIDES IN CONSEQUENCE OF THE FAMINE”(参见附图3)。^{[12]20}不仅两个图册中的中英文标题所表述的内容完全一致，而且在各图的说明性文字上，两个图册的内容也具有——对应的关系，例如，《河南奇荒铁泪图》第一幅图的说明文字是：“旱灾以后。薪桂米珠。借贷亲朋。彼此一辙。不得已而宰耕牛。质农器。褙衫破袄典卖一空。燃眉势急。更不暇为后日计。于是数间破屋。几亩荒田。亦短价轻售。甚至求售不得。遂作饿殍。其情抑又惨矣。高堂华屋中人。能弗怦怦心动耶？”^[13]而“THE FAMINE IN CHINA”第一幅图的说明文字则是：“For a time the sufferers could borrow from one another, but this came to an end. Then they killed their ploughing oxen and pawned their implements of agriculture, their coverlets and clothes; and at last they gave up all thoughts of the future, and fell to selling their furniture and the materials of their houses, and many of their fields, for a mere song, till at last no purchaser could be found. Think of this, ye who live in high halls and fine houses, and let your hearts move.”^{[12]12}

“丁戊奇荒”的灾情藉近代传媒之助，很快传到了国外，日、英、美等各国人士纷纷募捐，赈济华北灾民。尤其是日本在灾情宣传、募捐活动、赈灾组织实施等方面颇具近代特色。明治日本对清末“丁戊奇荒”的赈灾行动不仅是中日两国近代荒政事业的首次合作，也开启了中国灾荒史上国际救援的新纪元。^{[14]15}

二、明治日本媒体对“丁戊奇荒”灾情的报道

明治日本媒体最早报道晚清中国“丁戊奇荒”的是《东京日日新闻》，1878年2月18日的《东京日日新闻》以《清国：北部飢饉の惨状》为题报道了这次灾荒，其中援引北京的消息说：“北部の飢饉は実に当今の一大難事なり。諸方より聞く所に拠れば、陝西、河南の北部直隸の南部に於いては生民の惨状、寔に言うに忍びざるものあり。”报道还援引官报的消息说：“陝西の知事は北京政府に飢饉の現況を上陳し、陝西の一省に於いて餓死するもの、毎日およそ千人あり。目下飢饉に迫るもの、無慮五、六百万人にて陝西の人口のおよそ十分の七に当ると云えり。”^{[15]336}报道估计四省灾民多达千万，是此前印度饥馑灾民的五倍。报道还提到，北京政府面对灾情，告谕全国，从南方运来北方的赈灾米粮达600担；由于晚上气温只有3度，北方灾民不仅饿死者多多，冻死者也不在少数。

1878年2月28日的《东京日日新闻》以“陝西、山西、直隸、河南一帯の大飢饉”为题，再次报道了饥馑波及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清国北部の飢饉は日一日よりはなはだしく、郵船の支那より来るごとに通信者の報道する所も新聞紙の登載する所も、皆この餓災の惨状に係らざるはなく、陝西、山西、直隸の南方、河南の北方に跨りておおむね野に青草なしと云い、そのもつともはなはだしきは陝西省を以って第一とし、山西これに次ぐ。”报道援引清末大臣上奏灾情时的奏文说：“陝西、山西の二省の大災は実に酷烈を極め、餓莩

は市野に相望み子女を鬻ぎ枢肉を食うの窘厄に迫りたる必定なり。”报道还指出，由于持续三年的饥馑，陕西、山西两省的储备粮已经消耗殆尽。农民欲耕地而无种子可用，手工业者欲制作而无人可雇。无钱购买食物者不仅仅是老弱病残之人，就连向来孜孜向学的青壮年也四散逃荒而去，否则只有饿死。由于灾情严重和受灾人数众多，即便是富庶之地的陕西，地方官吏竭力募捐，也只能募集到60万抚恤银两，变换成米粮给灾民，每人最多可得1升。为应对空前严重的灾情，晚清地方政府的粮仓已经颗粒无剩，中央政府也是资财耗尽、元气大伤。当晚清政府诸多封疆大吏们将祸源归结于远征新疆喀什噶尔的时候，日本已经开始从近代科学关于水土保持的角度认识灾荒成因，报道援引澳洲《悉尼先驱晨报》记者的观点指出：“日本にても支那、印度の禍いを殷鑑とし早く森林の規則を厳行して、禍源を防止せざるべからず。”^{[15]336}

1878年3月20日《东京日日新闻》驻上海记者以“飢饉現地の惨状”为题，又一次报道了灾区的悲惨景象。报道指出，河南地方从光绪初年开始连年大旱，尤其严重的是祥符、荣泽、获嘉、济源、原武、孟县、洛阳、孟津、郑州、禹州、偃师、巩县、新安、淇县、延津、封丘、陕州、灵宝、汲县、汝州、伊阳、武陟、汤阴、阌乡、林县、新乡、辉县等二十七县赤地千里，寸草不生，饿殍覆路。“殊に靈宝、孟津辺は男女を売買し、房屋田産をも売らんとすれど買うものなく、人民は食を求むるがために親子兄弟おのがまにまに四方へ散り、十室の邑も九つは主なき荒屋と成れり。この極に至りても、なお住み馴れし故郷を去りて他国に吟行を悲しみ、餓えに苦しみながらもここに止まるものは、草の根を掘り木の皮を剥ぎわずかに旦夕の命は繋ぐほどなれば、死人ある時はその家内のもの人にも知らせず、ひそかに埋葬するものあり、かくせざれば飢民は手に手に庖丁を持ちてその家に闖入し、なかなか防ぐべき術なしと云う。去冬以来はもはや喰うべきものはまったく絶え、靈宝、济源のごときは白骨新屍枕籍して山を成し、ために行路を塞ぐに至りしと。”报道指出，河南饥民以黄河为界推算，北部有二百多万，南部有一百多万；另有山西潞安、泽州、遼州、蒲州以及陕西商州、同州等聚集来的饥民二百多万。^{[15]338-339}

三、日本各界赈济“丁戊奇荒”的募捐活动

《东京日日新闻》1878年2月18日的报道指出：面对邻邦人民的大量饿死，日本人袖手旁观，是于心不忍的；欧美各国已在中国多个港口举行了赈灾募捐；从上海到横滨，甚至欧美各国国内也举行了募捐，仅仅居住在横滨的中国人就募得一万四千多银元，日人无论如何不能够坐视。“側に聴く、我が東京に於いて某銀行会社の首長等は、この飢饉のはなはだしきを詳知し、別に救恤会を開くの見込みありて、その著手は不日にあるべしと、誠に仁の道と云うべきなり。吾曹は佇立してその日を待ち、日本人は東洋に於いて、もっとも仁慈の民たるの栄名に背かざらんことを冀望すべし。”^{[15]336}

上述东京某银行首长即是日本近代第一家银行“日本第一国立银行”创始人涩泽荣一。以涩泽荣一为首的日本慈善人士在1878年3月4日的《东京日日新闻》上发布募捐倡议指出：“それ窮を憫み厄を救うは慈善の情に発して、実に人生の徳行たるは識者の知る所にして、今や隣邦の人民のこの厄運に際するを見、吾人また宜しく今日救助の義挙を以て吾輩はここに若干の贖金を集合して、まず賑恤の資に供し、併せて世上の諸君に勸奨せんと欲す。”公告还规定了捐款的具体做法：1、在第一国立银行和三井银行设立救灾捐款账号；2、有上述银行支店的地方，直接捐至上述银行支店，没有支店的地方通过邮局汇至上述银行本部；3、上述银行本部将把捐款金额、人名登载到《东京日日新闻》、《朝野新闻》、《报知新闻》三家报纸上，公布于众。在各支店捐款的，各支店于次日将人数及捐款人姓名邮寄至本部银行；4、捐款截止日期为四月三十日；5、捐款金额尽可能换成日本米粮输送；6、灾区实地赈济手续以及募集金额的支付换算通过上述三家报纸详细公布于众。^{[15]337} 此举在日本社会引起不小的震动，上至皇室成员、政府要人，下至平民百姓纷纷慷慨解囊，参与捐助。^{[16]731-735}

1878年3月11日的《东京曙光新闻》以“洪沢栄一の主唱する援助金募集に異議あり”为题，报道了日本募捐活动中规定的中央公职人员的捐赠数额：大臣、参议每人捐款一千日元，勅奏官每人捐款二十日元，判任官收入二十日元的每人捐一日元，收入四十日元的每人捐二日元，收入六十日元的每人捐三日元。但是，针对这

些规定，日本有些部门出现了怨言：“吾が邦財政の困難といい、民庶は君の高き屋に登るを待つといい、なかなか以って人の疝氣を頭痛に病めぬとつぶやくよし、もっとも至極に聞えたり。またこの事を市中のものが聞き付けて、いや今度はいかなるおふれがまわるとも一錢も出せない、それとも国債でも払うわけならともかくもいいはやすとのこと。”^{[15]338} 针对《东京曙光新闻》上反对赈济中国华北饥饉的声音，《东京日日新闻》以“曙新聞などの飢饉救済反対を批判”为题，在3月19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北部诸省连年不收，酿成大灾，积粟已尽，树皮草根充饥，终至泥土为食，路途倒地，转填沟壑，那些挽救生命的赈恤之物实系九百万生民；中国政府和人民虽竭尽全力、锐意救助不怠，仍现饿殍塞路、饥民人肉相食之惨状；陕西、山西、直隶、河南之广袤大地数月无炊烟，此等惨状，亘古未闻；中外人士目睹此等大视，皆怀慈悲之心，广为报道。他们以慈善之人的恻隐之心，陈述了对中国北方饥饉的怜悯之情，呼吁日本慈善人士起而结救恤义会，以此冀望尽人民互救之义务。报道赞扬了涩泽荣一、益田孝、岩崎弥太郎、笠野熊吉四人的率先之举，指出他们在东京发起义赈会，聚集各方赈款，不计善人赈额多寡，只求共尽救恤之仁义；《东京日日新闻》、《朝野新闻》、《报知新闻》等报纸无不对此义举欢欣鼓舞；通过报道宣传，各界人士踊跃捐款，不几日即得到一万五千多善款。报道最后严厉批驳了《曙新闻》、《东海日报》、《民间杂志》、《问答新闻》、《近时评论》、《团团珍闻》等各报对义赈的攻击：“ああそれ諸記者が怪しむべからざるを怪しみて、救恤の義会は人情に出ずるの慈善たるを反思せざるはそも何ぞや、吾曹試みに諸記者に向いて、他人の飢餓を救うは人生の善行なるか如何と問わんに、(中略)その四子が我が貧民は未だかの飢民のはなはだしきがごときに迫らずと思いたらんには、その思想の当否を以ってこの善行を傷つけるに足らず。また我が邦内地の恤貧にはそれぞれの発起人あれども、支那の飢饉救恤には未だ我が邦に発起人なきが故に、我輩これを率先したるなりと云いたらんには、親疎の後先はたちまちに攻撃の力を失わざるを得ざるべし。”^{[15]338}

1878年3月20日《东京日日新闻》驻上海记者还报道了居住在上海的日本侨民对日本国内捐款赈济华北饥饉的反应：“新聞紙の到達によりて我が国にても支那飢民救恤の拳あるを知り、在留の御国人も一同に悦喜せり。外国人もこの事を聞き、かくてこそ日本開明の実効を現わせるものなりと贊嘆して措かずと云う。”^{[15]339}

1878年4月4日的《东京日日新闻》以“救済は米穀で”为题，报道了署名涩泽荣一、益田孝、岩崎弥太郎、笠野熊吉等人的行动计划：“釀金の期は四月三十日を限り広告致し候処、更に緩急を計って四月十五日にこれを局了すべし；(中略)右穀類を清国に輸送してその救恤を施行するに於いては、竹添進一郎なる者に委託し、まず該地方に赴きてその発給のことを処弁せしむべし。しかしてその処弁要旨は別に委託状を以ってすべし。”^{[15]339} 5月13日的《东京日日新闻》以“日本の救恤運動、清国紙が称赞”为题，报道了竹添进一郎一行抵达上海又转赴天津的行程，以及竹添进一郎写给涩泽荣一和益田孝的报告信函，其中写到：“拙生本月廿五日上海に着、今夕招商局輪船に駕し、天津に向け発航仕り候。北地の景況聞繕め候処、河南、山西等今以って餓莩路に満ち人相食み、実に不可信の惨状を現わし、(中略)今度賑恤の一件上海申報にて深く称赞致し候間、向後交際或いは貿易上に付き、いくぶんの好影響を来し申すべきかと内々喜悦致し候。”^{[15]339}

1878年5月31日的《东京日日新闻》报道了涩泽荣一、益田孝发起的捐助中国北方饥饉的活动已筹集善款三万日元，并介绍了中国驻日本外交使节及其随员的捐款情况：“金三百円欽使何如璋、金二百円副使張斯桂、金百六十円參贊領事余某、金百円黃遵憲、金百円范錫明、金百五十円陳文史。その外随員中金百円吳広沛、金百円潘任邦、金百円張宗良、金百円雇いアメリカ人麦嘉諦、金六十円廖錫恩、金六十円陳文熒、金六十円沈笛雲、金六十円馮昭偉、金三十円任敬和、金三十円劉坤、金三十円張鴻淇、金三十円何定求、金三十円陳衍範。”报道还介绍了中国驻日外交人员的捐款由横滨中华会馆的董敬谨办理送往国内，经李鸿章上奏，发放给了山西灾民。^{[15]339} 7月24日的《东京日日新闻》以“救恤總計三万余円”为题，报道了日本期限内赈济中国的捐款总额：“支那餓民救恤釀金期限後出金の分(中略)總計三万五百八十円九十銭、洋銀百三十四弗。”^{[15]340}

关于日本赈济“丁戊奇荒”的消息还经常出现在当时上海的《申报》上。为了便于开展募捐，上海成立了

“协賑公所”，并在旧金山、横滨、长崎等地设立“筹賑公所”，满足了当地华侨援助故国的愿望。《申报》经常登载各协賑机构的账目清单。1878年4月24日《申报》曾登载了居住在日本横滨的中外官绅的捐款总数已达到12320元，^[17]第1841号第3版并详细登载了具体捐賑名单，对捐助者通过《申报》公布于全国读者，进行表扬。这次捐助中国灾荒的国外賑款来源十分广泛，跨越两半球，涉及四大洲，至少有11个国家或地区参与了捐賑。在亚洲，日本的对华捐助最为显著，《申报》上刊发了多篇日本捐賑的信息，如《日商捐銀助賑》、^[18]第1506号第1版《日本助賑》^[19]第1811号第2版等；《万国公报》上也刊登有《日本酒业捐賑》、^[20]第八册：4981《钱米助賑》、^[21]第八册：5007《横滨賑款》^[22]第九册：5515等信息。

四、竹添进一郎赴华賑灾过程及中日之间围绕賑灾展开的外交活动

尽管日本国内针对賑济中国华北饥饉出现了各种反对的声音，但募捐活动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截止到1878年3月20日共募得善款27800余日元。竹添进一郎4月25日抵达上海，29日晚乘船向天津进发，并给涩泽等人写信简要陈述了华北灾情。^{[15]339}

6月12日，《东京日日新闻》以“天津近傍三万余の飢民を救う”为题，报道了中国救恤委员竹添进一郎向日本国内捐款人发出的第三次救灾报告，其中详细描述了救灾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賑灾经过：“かの地凶歉の最もはなはだしきは山西省となし、今この地に米穀を送らんとするは、たとい清官の保護を求むるも行いがたしとす。よって、竹添氏は池田領事君と商量して丁道台の意見を聴き、以って天津近傍に蟻集する所の三万余の飢民を賑恤すべきことに決議せり。”竹添进一郎还提到在雇佣中国灾民过程中曾发生了偷窃现象。为此，他将此事回报给李鸿章，请求协助，李鸿章欣然应允，并对日本的义举深表感谢，竭诚帮助他们将賑米运抵各粥场。“竹添氏は日々各廠に出張して、毎日糜する所の米穀とその給与を受くる飢民の数とを査察して、以って自他の失謬なからんことを要し、かつ我が賑助の清官の給与と混雑せざらんことに精々注意すれば、連日未だ宵旰を免かれずして、また我が領事館の諸名も精を抽で賛成せらるると云う。”关于晚清政府的官賑，其中讲到那些从南方远途跋涉，运粮到山西的官员难免发生舞弊，但是在李鸿章管辖范围内，绝无舞弊的事情，命令得到严格执行，官员们也都恪尽职守。日本方面庆幸日本的賑灾活动得到李鸿章及其下面各级官员的提携，既省却了运费，又避免了官员腐败。^{[15]340}由于华北饥饉的严重性和持续性，灾区物价极不稳定，报道还提到竹添进一郎对当时天津一带粮价情况的描述：“天津近傍は他の凶荒に感じて生理すべて蕭索たり。その米穀、小麦、粟等の市情は極めて沸騰の勢いたりしが、兩日の雨あって以来少しく低價をなし、五月初旬の行情は摺上小麦一石に付き（日本百三十三斤余）、天津兩二兩五錢すなわち三弗六十二仙、白米一石同上三兩六錢すなわち五弗二十二仙ばかりなりと。”^{[15]340}

“丁戊奇荒”发生在清末“洋务运动”期间，不可避免的受到“洋务运动”时期建立在“条约”基础上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使清政府在外交礼仪和制度上，逐渐适应国际上通行的外交方式，对外国的救济援助表示感谢。1878年5月31日的《朝野新闻》以“飢饉救濟米、天津に着く”为题，报道了外务大輔森有礼关于日本賑济中国的信件，其中提到他回国途中在天津接见李鸿章前来感谢日本賑济中国一事：“足下等御配慮これあり候、清国饑民救恤米若干石、過日天津港へ輸送相成り候處、今回拙者歸朝の途、同港に於いて救恤事務専任たる直隸總督李鴻章、親しく拙者の寓居に就き、我が国醜金の諸氏、殊に各位主としてかく恩挙を行われし段、その仁情厚意感謝の至りに堪えざる旨、懇々謝辞拙者へ申し聞かせ候、この段申し入れ候なり。”^{[15]340}1878年6月24日的《东京日日新闻》又报道，李鸿章曾致函驻日公使何如璋，要求他对日本国民救济两省（直隶、山西两省）的义举表示感谢，并计划将到访日本，向日本捐赠者亲致谢意：“このごろ清国李鴻章氏より本邦に駐劄の公使何如璋に書をよせて、二省の凶荒に付き日本国民が救恤の義挙ありしは、実に感銘に勝えざる次第なれば、卿自らその人を訪らいて厚くこれを謝せよと告げ越したるにより”。报道说，何如璋不久即亲临第一国立銀行，当面向涩泽表示了谢意：“このほど同氏は第一国立銀行に來り、渋沢君に面晤してねんごろに謝詞をのべられたりと聞く。”^{[15]340}

五、结语

“丁戊奇荒”作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次特大自然灾害，大大加剧了近代华北社会转型的阵痛。同时，在救灾过程中不仅融入了诸如灾荒成因认识、救灾手段选择、灾情宣传与募捐等近代元素，而且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跨国性国际救援合作，其开风气之先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成为中国荒政事业的转折点。在“丁戊奇荒”赈灾过程中，无论是明治日本媒体的大量赈灾宣传，还是涩泽荣一等人的募捐活动以及竹添进一郎对赈灾物质的调配管理，清末中国的洋务派都积极配合，李鸿章亲自接见日本赈灾人士或指示驻日使节表达救援谢意，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一种近代新气象，述说着一种近代文明话语，既体现了日本对中国人道主义援助的热情，又暗示了中国荒政事业的近代转型。

[参考文献]

- [1] 光绪山西通志·慌政记 [Z]. 北京：中华书局，1990.
- [2] 杀女疗饥 [N]. 申报，1878-03-21.
- [3] 四言劝赈歌 [N]. 万国公报，1878-06-15，万国公报第八册，台北：华文书局，1968.
- [4] 夏明方. 救荒活民：清末民初以前中国荒政书考论 [J]. 清史研究，2010（2）：37.
- [5] 阅河南奇荒铁泪图书后 [N]. 申报，1878-03-15.
- [6] 捐赈新条 [N]. 申报，1878-04-25.
- [7] 书同仁辅元堂设筵劝赈启后 [N]. 申报，1878-05-14.
- [8] 论移资助赈之难 [N]. 申报，1878-06-15.
- [9] 朱泚. 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 [M]. 2006.
- [10] 高橋孝助. 飢饉と救済の社会史 [M]. 東京：青木書店，2006.
- [11] 李文海，夏明方，朱泚. 中国荒政书集成第8册 [Z].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 [12] Committee of the China Famine Relief Fund. The Famine in China [M]. London: C. Kegan Paul and Co., 1878, Yale DMnity Library.
- [13] (清) 田子琳. 河南奇荒铁泪图 [O]. 清（1644-1911）刻本.
- [14] 安特利亚·扬库. 国际人道主义在中国：从20世纪初的灾赈谈起 [J]. 史学月刊，2014（4）：15.
- [15] 明治ニュース事典編纂委員会，毎日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ズ出版部. 『明治ニュース事典』（明治11年-明治15年. 第2卷）[Z]. 東京：毎日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ズ，1983.
- [16] 涩泽青渊纪念财团龙门社.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25卷 [Z]. 东京：涩泽荣一传记资料刊行会，1959.
- [17] 纪横滨绅商捐助晋赈银数 [N]. 申报，1878-04-27.
- [18] 日商捐银助赈 [N]. 申报，1877-03-26.
- [19] 日本助赈 [N]. 申报，1878-03-23.
- [20] 日本酒业捐赈 [N]. 万国公报，1878-05-18，万国公报第八册，台北：华文书局，1968.
- [21] 钱米助赈 [N]. 万国公报，1878-05-25，万国公报第八册，台北：华文书局，1968.
- [22] 横滨赈款 [N]. 万国公报，1878-10-05，万国公报第九册，台北：华文书局，1968.

附图：

图 1 英国伦敦1878年翻刻《河南奇荒铁泪图》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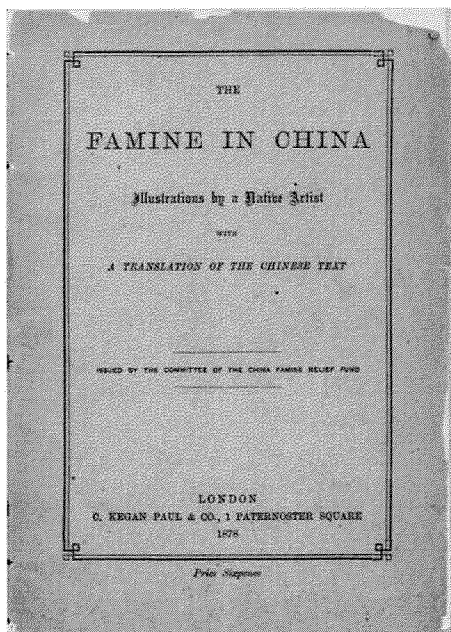


图 2 英国伦敦1878年翻刻《河南奇荒铁泪图》十二图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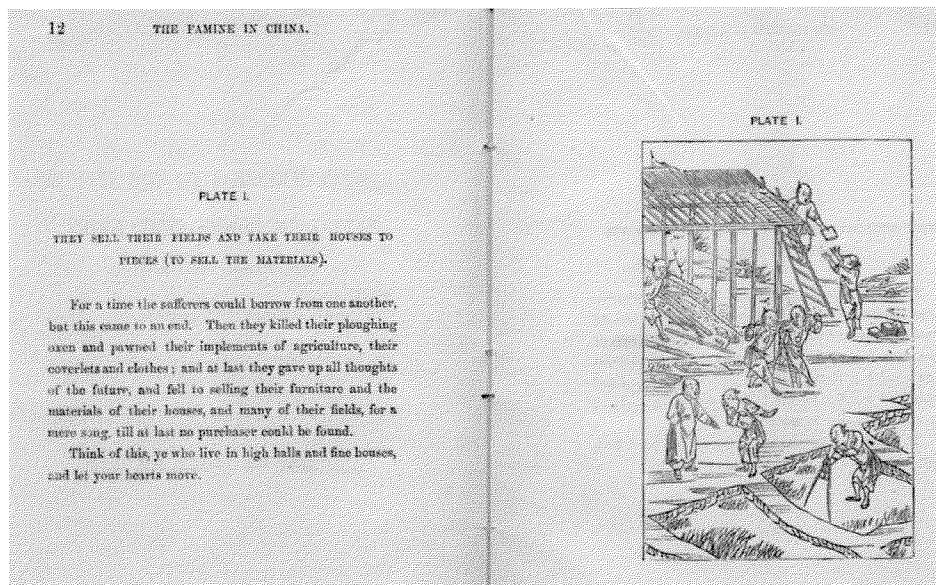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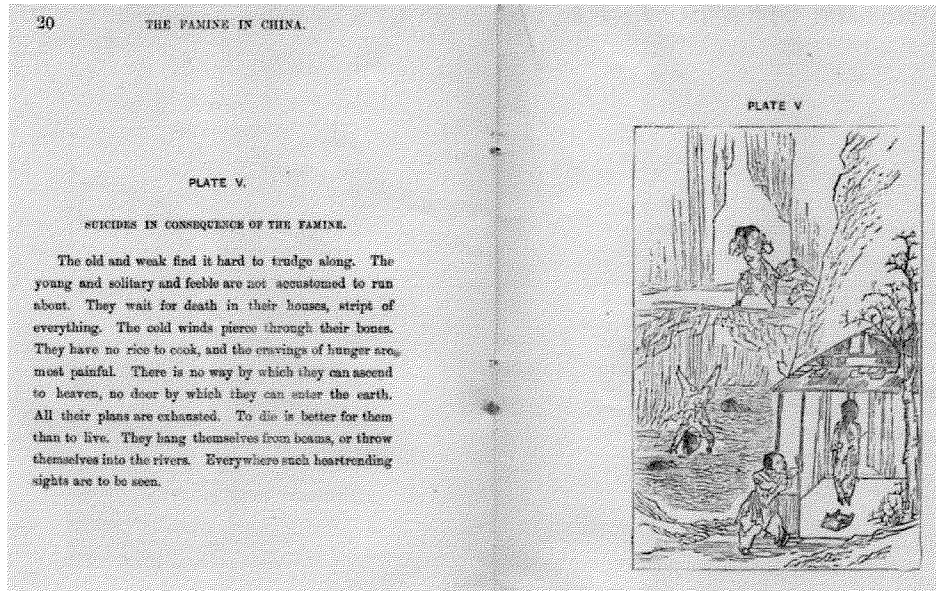


图3 英国伦敦1878年翻刻《河南奇荒铁泪图》十二图之五



付記：

本稿は暨南大学2019年度連続助成教学改革プログラム：日本語文法教育における「協調学習」の深化応用研究（番号：JG2019004）の助成金を得て完成したものである。

李冬松（LI Dongsong），大東文化大学語学教育研究所客員研究員、中国暨南大学外国語学院教師、厦門大学中国文化史博士課程修了。